

遊走於體制內外



香港的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

許寶強 張秋玉 編

OXFORD



身體與創意的邊緣化

游靜

聽過Ricky楊秀卓說的話，令我感動。因緣際會，我曾被派去觀察他的課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整個禮堂也坐滿了中學生，差不多有四百人吧？Ricky當時講授的題目是菜園村，他令我感到香港充滿希望，就是這類人令香港有改變的可能。

身體任誰建構

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過去數年教授創作過程中收到的學生作品，以及有關的經驗和感悟。讓我由修讀文化研究的本科生的一份作品說起，通常在教創作的時候，我會要求他們寫logbook (日誌)，logbook就像日記，你要把創作過程寫出來，當中包括對媒體及創作過程的反思。這是關乎情感，也是關於技藝。學習了的技巧不等同你學會按哪個鍵，而是你學了用甚麼技巧幫助你表達你自己，與人溝通，例如如何游說母親讓你在她背上寫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技術。曾經有一位一年級的文研本科生在logbook的第一頁貼上這張照片，上面寫着：「第一次出外錄音。情況：正在錄紅綠燈，好尷尬！」

讀過我教創作的同學都知道，雖然我會教拍錄像，但開始時卻不讓同學碰攝錄機，而要同學們先學用錄音機，先學最基本的「聽」，才准「看」。當這位學生試錄紅綠燈的聲音時，發現他每天過這條馬路，每天都得聽紅綠燈過馬路，但他發現一拿出收音器材，站在路邊錄音時，街上的人都看着他，他感

到非常尷尬。這個問題應怎樣解決？我認為這個練習很有用，是一個難得的經驗。原來我們站在香港街上時，我們的身體均受很大程度的規限，當你做一件跟別人有少許不同的事情(包括我們的衣着、站立姿勢)，你便會害怕，或者感到很丟臉和尷尬。我們不是很喜歡取笑內地人蹲在街上嗎？為何不反問，香港人等車等累了，為何不蹲在地上呢？我們從前經常取笑內地女士的打扮，說她們怎麼會穿裙子時，搭配一條短絲襪？我們可反省一下，為何我們不像她那樣穿呢？原來我們如何穿衣服、如何乘涼、如何站在街上等車、如何表達自己、我們想像自己是如何被別人看的，都在建立與被建立你與社會的關係。如果你不去裝備自己思考這些關係建立的過程，如何能拆解社會一直以來怎樣教育你用某一種模式 carry (盛載) 自己的身體，以及如何將自己的身體置於這個社會，又如何能透過創作重新想像與再現不同的身體及關係？為何學習創作要由基本做起？甚麼是「基本」？Simone de Beauvoir 說，「身體是一個處境」。意思就是我們的身體不是一塊鐵板，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被改造，性別、情感以及身體的每一部分也正在不斷被打造。至於要學習掌握打造這處境的過程，就得透過認識及掌握情感的技藝。以剛才那位同學作例子，如果他重新思考他跟社會之間的關係，重新思考為何要記錄紅綠燈的聲音，在記錄的途中為何會感到害怕和害羞？如果他去思考這些關係，他可能就能改造自己的身體，改變他錄音時的姿態，進而獲得完全不一樣的效果。在這個練習中，正因他太害怕自己的尷尬，收音時手蒙着臉、米高峰貼着燈柱，於是錄到的是吱吱的、燈柱震動聲，多於紅綠燈本身所發出的咚咚聲。因為他的怕，所以無法做好一個看來是基本的創作練習。

我一九九九年回到香港並在一所設計學院任教。二〇〇〇年，我遇到一位一年級學生，叫洪榮傑，他現在是香港滿有名的年輕導演，在浸會大學教電影製作。傑仔當年完全沒有拍過片，第一次上我的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Video Production (錄像製作入門課)，想拍一齣短片，名叫《無人》(Invisible People, Kit Hung 2000)。當時十九歲的他在掙扎「出櫃」——父母不認同他，婆婆亦把他趕走，他無家可歸。他在這樣情況下寫了一個關於超現實世界的故事，取景於他同學的家，一個典型的香港公共屋邨裏。在這超現實世界中——暫且說我們不知這是哪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操控人到一個地步，會把晶片植入人體作為一種實驗，而你不知道這實驗在如何編造你，片中的主角被編造得會突然失蹤，有如隱形，所以英文片名為 *Invisible People* (隱形的人)。影片包含不只一個比喻，導演自身一方面在控訴：同志在香港社會，經常被視作「透明」；又同時在思考：我們社會對身體的規訓，就是要你變透明。他寫的故事，嚴格來說並沒有直接處理同性戀議題，但卻具體表現了一個人被國家被社會操控、規訓身體，而且不知道那些規訓在哪裏、是甚麼，這個人的主體情感是怎樣？他的生存空間如何被影響？

創意任誰扼殺

在香港學院，我不斷發現，創意是如此被邊緣化的一回事。於是這數年來，我在學院以外、同志社群內嘗試辦工作坊，也嘗試從同志主體出發辦展覽。比如這個在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展覽「你們看我們看自己—同志創作展」，當中有一首工作坊同學的打油詩，題為《B & G SMS 絕密私語(啜核私處)大公開》，是這樣的：

B 唔見唔見又一day
 想見想見又無say
 談情說愛似可悲
 其實開心到起飛

G 闊別忽忽三數天
 與B思念越是濃
 乍悲還喜憑誰定
 離合散聚自有時
 何須庸人自擾之

B 闊別彷彿三數天
 思念猶似三五年
 乍喜還悲憑誰定
 惟靠短訊三五言
 小B化灰G跟前

B 好想抱抱吹下你
 又想咀咀脷疊脷
 可惜傷風無得咀
 抱住枕頭當係你

G 好想接近嗲下你
 跟住親親搵大髀
 又怕功課做唔起
 惟有乖乖摸自己

這首比每天大多在街頭隨手可得的異性戀中心刊物都要含蓄的游戲之作，被淫褻物品審裁處裁定為「不雅」，據說關鍵字是题目的「啜核私處」。因為被要求「抽起」作品，我翻查

了同年主流中文媒體；「啜核」果然是報紙傳媒的常用字眼，意指「刁鑽」、「妙極」。《明報》通識網(2006年3月21號)：「是日啜核金句，衛冕第一擊丁俊暉：壓力好大」；《香港影庫》專欄文章：「一句『唔賭唔知時運到，唔滾唔知身體好』啜核程度爆燈」。至於「私處」，台灣廣播電視基金會對傳媒描寫身體部位有如下介定：「私處是身體的一部份，每個人都應該尊重它，故陰部可以說為『私處』或『下體』，是既不粗俗也不會引起誤解的」。這次審查事件可見香港社會制度對想像身體、想像慾望，尤其是以非異性戀為中心的慾望與身體的高度規訓，不但雙重標準，更輕易就能以言入罪。不是常聽說香港是一個享有高度言論自由的社會嗎？是誰的言論，怎樣的言論呢？這事件也暴露了性與性別議題，並不是一般人常常假設，只是一些旁枝末節、無關痛癢的小事，與社會政治如殖民、本土等「大論述」沾不上邊。廣東話的特色與長處是生動活潑、刁鑽抵死，充滿鮮活的意象與比喻。不少日常流通的廣東用語若要翻成普通話或英文，要不無法翻譯，要不就被指不雅，像「又想咀咀脷疊脷」，意思其實極接近一九五四年張露唱的《給我一個吻》(當然被無數人包括蔡琴翻唱過)：「我也要向你請求絕不灰心/ 縱然閉着你嘴唇你沒回音/ 我也要向你懇求絕不傷心/ 給我一個吻可以不可以。」

香港長期內化了源自英國殖民時期管制言論的標準，導致不少港人對本土語言文化特色不夠理解與尊重，透過審查制度規限自己語言最活潑的成份，深切展現甚麼叫「殖民性」。

當時我們做了三十多張易拉架掛在文化中心的大堂。學員對創作表達都很積極，但大多不能出櫃，不能被人知道自己是同志以及知道他們參加了這個工作坊。因着這些限制，他們想

出許多不同的方法，譬如不去拍攝自己的臉等。這一系列的三張作品——到灣仔球場去拍攝菲律賓傭工打球；菲傭放假時換上叫自己最舒服的性別角色，展現平日不能夠表現的多樣性別。他們同樣面對不能出櫃的敏感問題，拍攝者於是避免拍下其容貌，只會拍攝其背面、側面，或者快速移動的動作，因快门不夠快導致臉孔變得模糊。從這組作品，大家能夠清楚觀察到有不同的多元性別，即使她們生理的性別被認為是女人，透過星期日的日常社交及歡愉活動，她們重新改造自己的身體，展演她們認為更開心、更自在的性別。更有趣的是同學本身不能夠於日常生活中表現自己的性別，他們要透過拍攝別人的目光、凝視，去獲取、想像自己的被認同、被欣賞。這個溝通的過程十分有趣，顛覆了媒體理論一般指把持科技者較有權力的假設。外籍家傭明明是香港的弱勢社群，但在這組作品中，我們不幸地看見最弱勢的是那位持着攝影機拍攝她們的人，那位攝影師不能夠表達自己的身體性別，反而羨慕菲傭的自在自由，她們的身體性別此刻能展現與被社群欣賞，又不介意社群外的人觀看自己的目光。

「身體是一個處境」

在二〇〇五至二〇〇六年，我到台灣教書時，剛巧碰上「樂生事件」如火如荼(樂生療養院被迫遷)。在一九二〇年代，日戰時期的台灣興建了全國第一間痲瘋病院，一班痲瘋病人被強制送到一片荒蕪之地。現在政府想把地皮取回用作興建捷運。住院五、六十年的院友都視痲瘋病院為他們唯一的家，當年他們被殖民者強制送進來，現在已沒有家人朋友，突然台灣政府又要把這批公公婆婆趕走，並迫他們適應新環境，故



「你們看我們看自己同志創作展」展版之一(女同學社，2007)

此一班年輕人前往聲援，集合起來一同抗爭。當時我正教授一個紀錄片理論與製作課，有兩個學生便去拍樂生院的院友。我們談身體時，經常是想像一些很標準的身體，像現在開始流行認同一些有肌肉、健康、富男子氣概的男同志身體，成為某些新標準。要呈現一些不健康的的身體時，通常都會帶一些可憐、憐憫、要救援、要糾正的眼光看待他們，但這兩位同學拍攝出來的東西卻完全不是這樣。

《樂生活》(林婉玉、許雅婷，2006)對病人的再現及病人的自我呈現(self-representation)很特別，呈現出長時間與疾病共存、被疾病介定，但經過思考後反客為主，能夠擁抱疾病與污名，至挑戰主流目光標準，歲月一步步累積出來的，每人獨特又不卑不亢的身體成果，也許這就是武功最高強的技藝了。這些公公婆婆可以很自在地說：「我生病而已，生病有甚麼好害羞的呢」。我們從小於華人社會



《樂生活》劇照

中成長，當你生病時，媽媽會說你「打敗仗」；病多少帶着污名、罪咎感，彷彿生病就是錯。但在片中這些患過重病、被社會完全唾棄的人竟然可以笑着說，自己幾乎被人扔去填海了、現在「手都拐彎了」等等；數十年來他們切身體會到，社會對身體極不合理的要求、社會對自我健康想像的虛偽；以及病的日常性。也正是這種與污名並存，與透過將之平常化於是將之拆解的經驗，叫他們面對高官強權也臉無懼色。社會的不公義就是身體所承受的「病」；身體如何消化「病」也就是如何消化權力結構。這份領悟令我們重新思考，甚麼叫「身體是一個處境」，尤如處境劇不斷會有新角色加入，也會有不同的橋段冒現。我們學習新的知識，遇上新鮮的人及環境，發展新的興趣與慾望，也遇上國家社會層出不窮的，新的規訓，身體也會隨着不斷改變及被改變。我們要學習處理這些不同的改變，同時學習掌握身體的呈現與改變的自主性；哪些呈現、哪些改變是鞏固了既有的不公義制度及不公平規訓，而哪些呈現、哪些改變是可以協助我們去鬆動它們，從而為每人的身體，打造更廣闊的自由和自在？也許這樣的學習，也就是今天在香港，最需要學習創作的技藝了。

討論 III

李小良(主持及評論)：感謝游靜帶來一場那麼聚焦身體、性的形塑的分享。餘下時間不如請所有講者上台，就各位從事身體、情感與技藝教育的經驗中，看看還有沒有甚麼補充？或者我在這裏補充一句，我覺得現在香港這個主流社會裏，身體是要被覆蓋的，感情是要被壓抑的，技藝是要去考八級的。在這狀態下，請各位「技藝」教育工作者繼續討論一下。

楊秀卓：正如我剛才提到，中學的教育極為乏味，同學上堂，叫做「學會」了，回家做做功課，再來上堂，功課對了就好。情感教育則是壓抑的，要不然就是不講或避談。譬如看見有學生拍拖，訓導老師就過去指導他們說：「你們兩個不可以這樣的。」如果在商場看到他們拖着手，翌日就會召見他們，問問他們有沒有拍拖。最近學校發生一件事，荒謬極了，是學生說給我聽的。我們不知在廁所或哪裏發現一個避孕套，訓導老師大為驚訝，抓來所有有嫌疑在拍拖的男女學生，當眾問他們有沒有在那裏性交。學生之間拍拖，互生情愫，干你甚麼事？如他懷疑同學可能是一對戀人，就通通把他們抓出來。我認為，在我們的學校裏，情感根本是被壓抑、被忽視，甚至被看成是一個大問題，是不能說的，連擁抱這類表達情感的身體語言，都是不被允許的，看到都會說：「這是校園，你們不可以這樣！」這些情感的流露在我們學校或普通中學裏都是被壓抑的。如果這樣下去，一直不能表達自己的情感，我們怎樣創作？我認為這是我們的教育裏糟糕頂透的地方。

李小良：或者由黃津珏接下去。你們在教與學，搖滾樂 rock and roll 和街頭音樂等等方面，還有甚麼能分享？

黃津珏(阿珏)：我記得許寶強在堂上提過 John Holt 所寫的 *How Children Fail* (中譯本：孩子如何失敗)》，說學校教曉你的，其實是厭煩(boredom)、混淆(confusion)和恐懼(fear)，大概是這三種感受，有記錯嗎？看看香港的狀況，果真如此！我覺得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廣義上，不單學校，傳播媒體也算是一份子，我們要做好的就是去除這三種感受，把妨礙學生創作的恐懼等等拿掉。那些感覺與我們怎樣面對社會環境關係密切，就像小良方才說起我和警察的那件事。不知我是否天生注定特別容易與警察碰撞，但同時我跟他們亦特別多機會傾談。前兩天我在西區重案組和他們聊了一整晚，聊香港的政治、民生、現況，你會看到他們的恐懼，害怕改變，擔心未來，可是香港這地方是他們也有份兒的。我與警察聊天，傳媒當然不會拍下來，他們只會捕捉衝突的時刻。理性討論的空間是重要的，香港現況尚且微妙，因你還可以與警察這所謂權力的伸延進行理性討論，這種機會何其難得；你看韓國的社運，是不可能出現這類討論的，社運人士只顧向前衝，精於軍訓的警察則時刻手執棍棒；在泰國，得罪皇室就足以判監七年……哪來的討論？香港現處於公民覺醒的狀態，包括警察在內，他們自己都有好些想法，當然他們也會受到壓制，事實上警察受到更多壓制，以防止他們搞公民運動。我覺得恐懼是教育的一大難題，對社會、家庭、學校亦然。所謂技藝、創作，是助你拿走恐懼，讓你的情感得以宣洩；所謂創意教育，則是幫我們去掉(unlearn)一些學過的，拿走一些所知的。

賴恩慈(阿Mo)：哈囉，我發現在座有不少老師呢！我想起以往一些在校的教育經驗，現在香港固然有創意書院，有如楊秀卓這般優秀的藝術老師，但原來真的有正規學校是不相信身體、情感和技藝教育的，這種不信任導致學校壓抑這些方面。我想起過往在一間小學教戲劇的經驗，那間學校當初找我當導師是因為學校參加了學校戲劇節，希望我幫忙排些戲，拿個獎，僅此而已。我在那裏教了好幾年，校長看過演出後，竟然問我不如試試教歷史，我驚訝得問道「甚麼？」。我向他解釋甚麼是戲劇教育，他就着我不如試着用戲劇的方式教歷史，那怕是幾堂課。我覺得好極了，歷史科是正規教育，他們卻肯讓我嘗試，校長顯得十分開明。然而，負責歷史科的老師卻害怕起來，但由於是校長下令，他不能拒絕。那位歷史老師在我入課室前再三囑咐，說學生們快要考試，校長其實很在意成績，如果考試不及格，那誠然不是好事，現在又用了幾堂課跟他們玩，不是浪費了上堂的時間嗎？我明白老師的擔心，我就告訴他，不如讓我試一兩堂，如果同學的成績一落千丈，我便主動跟校長說這樣行不通，或需要更長的時間做準備。於是，那兩堂變得很關鍵。那一課講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我嘗試用身體、情感教育的方式教他們這段歷史。他們的課程需要他們背誦某些要點，例如軍票、全民學日文，寫出要點便能得分，然而我叫他們上堂不用拿出書本來。我跟同學說：「今天所有同學都要好認真，要進入角色。不準你們說廣東話，我教你們說日語的早晨，大家要照着講，講錯了要罰。」一開始時他們有點鬧着玩，之後就真的進入了平民的角色，就像當年受日本軍人控制的平民。他們開始感受當年平民百姓的經歷，要辛苦地學習我創造出來的語言以對答，這就是第一堂。第二堂說軍

票，牽涉好些繁雜程序，我先沒收他們的零用錢，換成白紙，有些學生立即喊道，一會要買東西吃，那些白紙怎能用？兩堂之後，我問他們的感受，他們說原來要被迫改用另一種語言，或不許用自己語言來溝通，以至這樣受壓迫地活着是很淒慘的。他們分享感受以後，接着自發上網或到圖書館找教科書上沒有的資料，回來跟我說，香港淪陷時還有這個，還有那個。那位歷史老師後來說，同學是從未試過這樣自發找資料的。學生很信任我，像玩遊戲，那是引發一種使人自學的推動力，因為身體、情感是一種經驗，只有經歷過才最能使人主動學習。所以我希望香港不單能有更多創意書院或像楊秀卓一樣的老師，還能有更多由校長至老師全體均相信這種教育的正規學校，那就好了。

游靜：剛才楊秀卓說學校教育裏面普遍忽視情感教育，在廁所找到避孕套是一例，這個例子不單否定了學生的情感，更有趣的是它否定了學生的身體。當今香港向學生灌輸的教育是充滿恐懼與沉悶，尤其是恐懼，尤其對身體的恐懼，包括性。比較宏觀地看中港台文化，香港人是最(被)否定身體的。你隨便到一個公園看看，不准你做的還多於允許你做的，公園內有幾十個不可、不准。本來你以為公園是一個可以讓你身體放鬆的地方，但原來放鬆的活動公園是不允許的，何其諷刺。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允許你的「身體」做很多事情。當我們得在這般教育環境下長大，實際上是不斷被灌輸，我們的身體並不存在；身體只能是工具，一具功能化的身體。你會發現香港大部分公共空間都是這樣，就是上班下班坐地鐵吃飯購物，只剩這些，其他東西都不許做。剛才說到的塗鴉或者跳舞唱歌甚至

晒了少睡一回，在香港的公共空間都是犯法的。我們現在討論的，還不是現在才發生呢！今日只是變本加厲而已。當愈來愈多東西被禁制，你想想香港的未來會變成怎樣？大家回到各自的崗位不妨想一想，我們可怎樣鬆動這些對身體的持續規訓，以及對性日益擴大的恐懼呢？如果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在我們的課堂家庭工作範圍內，思考如何能讓身體有多一點自主、自由的鬆動、對性的鬆綁，讓大家不再那麼懼怕性懼怕身體，這樣的話，也許至少可以令大制度變壞的速度得以放緩。